梁　漱　溟

[人物小传]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广西桂林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1916年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总长秘书。1917年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主讲印度哲学。1922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是他思想体系形成的标志。1924年辞离北大，去山东自办教育，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经数年努力，1931年与梁仲华等人在山东邹平县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以乡建派领袖身份，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并赴香港创办其机关报《光明报》，任社长。1946年，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参加“第三方面”人士国共调停活动。同年，受民盟总部委托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揭露了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暴行。1947年退出民盟后，专事讲学与著述，并完成了《中国文化要义》一书。1950年初，由川北上，应邀到北京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55年，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因拒绝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而受到围攻，但他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1980年后相继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并重新活跃于学术舞台,完成了 50 年前着手的《人心与人生》。1988 年 6 月,于北京逝世。

梁漱溟出生于甲午战争的前一年，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早年醉心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赞同‘君主立宪’,后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辛亥革命后，其思想由西洋功利主义转向佛家。1916 年在《东方》杂志刊出的《究之决疑论》,评判中外古今各家学说时尤推崇佛学“:东土学术。凡百晦塞,卓绝光明,唯在佛法。”1920 年，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在北京大学作课外讲演。1922 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反应热烈，毁誉不一。是书为梁漱溟由佛转儒的象征，故在第八版自序中声称‘归宗儒家’。这里的‘儒家’已非孔孟之本意，而是糅合柏格森主义与阳明心学、泰州学派，杂揉中西文化的“新儒家”了。由于受王艮父子的泰州学派的平民化学风的强烈影响，遂由书斋走向社会，力图把自己的主张贯彻到社会实际中去。20 年代中叶起，他与当时社会上方兴未艾的“村治”运动的各派广泛接触，并在南京、江苏昆山、河北定县等地作实际考察。1929 年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并接编《村治月刊》。1931 年在军阀韩复榘支持下，与梁仲华等人以山东邹平为实验县，推广其乡村建设的一系列主张。

这些主张系统见诸《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他从中西文化比较出发,认定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而无阶级斗争的特殊社会形态。中国的问题既不是政治也非经济问题，而是“文化失调’问题。要铸造一个有前途的中国,并不需要制度性的变革,只要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精神陶铸’工作,积极从事乡村建设实践就行了。缺乏阶级斗争观念与非暴力主义的见解，使他付出终生心血也未能实现其宿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坚决主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提出

“一多相容,透明政权”的主张。为联合中间势力,形成政团力量,促进联合抗日,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这个组织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与民盟的前身。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要求民主，争取国内和平，是他在抗战后到建国前的基本政治主张。这期间有《中国文化要义》的面世。该书系在《乡村建设理论》的基础上,对其几十年形成的文化观和政治主张的总结。断定宗教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离开政治与经济来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认为中国经济上无剥削、政治上无阶级,反对并批评唯物史观,进一步阐明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道”的中国社会特殊论。

建国以后，他同情并敬重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和为之进行的努力，并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认真的反思，并宣布“我已经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了”。由于在公开场合下声言农民生活太苦，并要考验当局“雅量”,毛泽东发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于是 50 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受批判。此后息影学坛与政界达 30 年之久。80 年代中叶，被称为现代中国“活化石”的梁漱溟又重登讲坛,宣讲中国文化,出版和完成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中国——理性之国》等著作。就其演讲内容和晚年著作来看，构成其思想体系的一些基本观点没有多大改变。

梁漱溟的哲学思想比较庞杂,一如其言“体系滋大,出入乎东西百家”,但并不是一个相当精致、很成熟的体系。他在新文化运动所掀起的反孔高潮中，出来维护和发扬孔子思想的普遍性，认为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其以柏格森生命哲学来融合阳明心学、泰州学派的中西合璧的新思路，使他完全居于从宋明儒学直接开展出现代新儒家的鼻祖地位。就新儒家的历史进程言，可以说是梁漱溟开其端，冯友兰、熊十力、贺麟等人竟其绪。

[主要著作]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此系作者 1920 年在北京大学、1921 年 8 月在济南山东省教育会两次讲演的结集。由陈政、罗常培编录而成,1922 年 1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后,反响热烈,一年之内,即由山东、北京、上海等地 5 次印刷。至 1929 年,商务印书馆已出至第 8 版,以后陆续有所翻印。1987 年 2 月,商务印书馆又出了初版的影印本。1989 年 5 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将该书收入《梁漱溟全集》第 1 卷 。

该书是在“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的高潮中出版的。“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是戊戌变法时期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论争的继续和发展。这两场论战,是近代中国文化古今中西之争的两个历史性高潮。东西文化论战参加者更为广泛,不象戊戌变法时期,只限于地主阶级顽固派和资产阶级维新派,小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分子都卷入了这场论战。纷然杂陈的意见,集中反映在“五四”前的《新青年》派与孔教会;“五四”后梁启超、梁漱溟与胡适、吴稚晖的争论中。就论争内容言,东西文化论战更为深刻,不象戊戌变法时期较多侧重于政治领域,而转向了文化领域,特别是伦理、人生观与哲学方面。按照当时人们的划分,所有意见可分为三派:全盘西化派、东方文化派、调和折衷派。各派均从自身所属的阶级或阶层,提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种种设想。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分子结成同盟,鼓吹定孔教为国教,封建复古主义为其解决方案;共产主义者从经济基础的变迁去解释东西文化,认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唯一出路;资产阶级内部聚讼不已,无划一标准。一般皆从各自信奉的哲学与文化观中构思未来的中国的蓝图,故胡适依据的是实用主义与有全盘西化倾向的文化观。被时人视为“东方文化派”的梁漱溟,则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了系统的、独到的

见解。

东方化还是西方化，对于中国来说，已经成为一个急迫的问题，必须在这两条路之间做出选择。在比较中西印三支文化后，选择的结果则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第 525 页）。中国文化会引导西方人到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这是梁漱溟的基本论点。

这一基本论点是通过唯意志论的宇宙观、直觉主义认识论与文化三路向说来构建的。

欣佩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叔本华的唯意志论的梁漱溟，认为“生命”是宇宙的本体，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非是“生命”不尽的绵延的结果。此“生命”又可称之为“没尽的意欲”。受佛教的影响，梁漱溟又用唯识宗的“见分”“相分”、阿赖耶识来解释柏格森的生命绵延与自由创造意志。

受唯意志论宇宙观的支配与决定，他视“生命”为认识的根本对象，夸大直觉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断定直觉是认识宇宙“生命”的唯一途径和最直接的手段：“要认识本体，非感觉理智所能办，必方生活的直觉才行。”（第 406 页）这种直觉主义认识论是梁漱溟利用与改造唯识宗，并用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解释唯识学后形成的。唯识宗在论述知识构成时，常用的基本概念是“现量”“比量”和“非量”：“现量就是感觉”；“比量”指理智，是认识过程中的理性阶段；“非量”即直觉，它介于“现量”与“比量”之间，但又对“现量”（感性认识）、“比量”（理性认识）有支配关系。柏格森强调直觉在认识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并把直觉看成类似本能的东西。接受这一观点的梁漱溟不仅宣扬直觉是人心中固有的本能，而且把直觉同孔子的“仁”、宋儒的“天理”、王阳明的“良知”等同起来，把非理性主义的直觉又儒学化了。

由于文化问题是时代关注的热点，因而运用唯意志论宇宙观与直觉主义认识论来为他的文化观服务，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文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起源、文化类型的划分、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是他文化观的三个互有关联的组成部分。

他断定，人的精神中的“意欲”是文化的根本或源泉：“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看文化根源的‘意欲’。”（第 352 页）文化不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而是“创造的活动，意志的趋往”。（第 372 页）他攻击唯物史观关于文化起源于物质生活的说法，认为这是一种被动的、对环境的反射，声称“文化这样东西点点俱是天才的创作、偶然的奇想。”（第 372 页）：“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是人类的天才——孔子和释迦牟尼的创作的结果。”“意欲”的活动借天才的奇想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文化。这是主观唯意志论的文化起源说。

至于人类文化的不同类型，梁漱溟以为是“意欲”活动上发生了分歧的产物。在西方人那里，“意欲”是向前要求的，其关注的对象是“外界物质”，因而走上了征服自然、天人相抗的道路，出现了以崇尚理智、发展科学为特征的西方文化，并以追求现世物质享受为人生哲学的目的。这是人类文化的第一条路向。在中国人那里，“意欲”是调和持中的，所关注的对象是“内界生命”，因而走上了人与自然浑融、天人合一的道路，出现了以崇尚直觉、讲究伦理的中国文化，求得内心的精神满足是其人生哲学的宗旨。这是人类文化的第二条路向。至于印度人，他们的“意欲”是向后要求的，所注意的是“无生本体”，形成了以崇尚现量、走宗教道路的印度文化，而厌离人世、求得解脱，则为其人生哲学的归宿。这是人类文化的第三条路向。

世界未来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是梁漱溟在该书中所设计的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在古代，古希腊人、古中国人、古印度人，“各以其种种关系因缘凑合”（第 525 页），形成了迥然不同的三种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因为有孔子、释迦牟尼这样的天才，没有走完第一路向，就走到了第二路向、第三路向，

这属于文化的早熟。尽管在理论上承认以宗教为核心的印度文化的复兴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归宿，但由于梁漱溟自身正处于由佛归儒的嬗变中，他以为印度文化是不切合现时实际的，当务之急乃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中国文化的复兴，还由于它比西方文化高明。对此他作了两方面论证：一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文化的弊病暴露无遗。西方思想界中许多有识之士，如倭铿、克鲁泡特金、罗素、柏格森等，都盛赞东方的中国文化，“他们要求趋向之所指就是中国的路、孔家的路。”（第 504 页）二是从直觉与理智去界分中西文化，强调直觉有高于理智的品性。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的根子在理智，中国文化的本原在直觉：“西洋人是要用理智的，中国人是要用直觉的。”（第 479 页）理智的功能让人们注重外在自然界，形成功利主义价值观，专走个体自拓的个人主义道路；直觉则叫人关注内在精神界，形成不计较利害的超功利主义，使人人做到尚情无我。“西洋人精神上受理智的创伤痛苦真不得了”（第 513 页），因为以理智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使人与人处于“冷漠寡欢”“逼狭严酷”的境地。直觉是注重情感的，以此为准则处理人际关系，则使人与人处于人我一体、浑融和谐的境地。唯一的办法是“拿直觉来拯救他们”（第 513 页），让西方人走中国文化的路向。

作为梁漱溟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不仅奠定了他自身思想体系的主心骨，而且为现代新儒家的出现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强调继承、发扬孔孟之道、宋明理学，以之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并以它为主体来接受、吸收和改造西方近代哲学，以寻求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出路，这一现代新儒家的共同特征，就是由该书所奠定的。至于对直觉主义的提倡与对科学主义的反动；对文化民族性的强调与对儒家道德价值的高扬；视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把文化提高到哲学水平加以探索等等的现代新儒家的一些共性，也由该书揭示了出来。尽管显得粗糙，但开山之祖

的地位不可抹煞。

《乡村建设大意》

此系作者在邹平县小学教师讲习会所作的讲演的结集，由李志纯、郝心静、侯子温据笔记整理而成。1936 年 1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出版，1939年，重庆乡村书店重印。1989 年 5月，被收入《梁漱溟全集》第 1卷。

20年代末 30 年代初，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国内外矛盾日益尖锐，而集中体现在农村。如梁漱溟所言，农村遭到“国际与国内的两重压迫，天灾人祸的两种摧残”（第 708 页）。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破产和崩溃的情况下，一些帝国主义如美国叫嚷要救济中国农村，封建地主阶级打出建设农村的口号。国民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行政院设立了一个“农村复兴委员会”，大唱“复兴”农村的调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些中间势力，想通过医治日益凋蔽的农村，以寻求济世良方，找到解决中国农村的出路。于是，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文化知识界的一些人士，如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高践四等人，纷纷在各省的一些县份如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昆山、无锡等地进行带有实验性的试点工作。一些高等院校如燕京大学、金陵大学、江苏教育学院等，也在身体力行地提倡乡村建设。“现在中国朝野上下的人们，都已注意乡村建设，社会团体、政府机关，都在倡办乡村工作，连外国人也有很多是想着来救济中国乡村的。”（第 620—621 页）《乡村建设大意》就是在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高潮中面世的。

以中西文化冲突造成乡村破坏为由，阐明乡村建设的必要性，论证乡村建设的实现，必须奠基于他所设计的乡村组织——邹平的乡学村学，此一集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军事为一体的基层组织，才能形成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中国问题方得最终解决。这是该

书的基本构架。

乡村建设成了当时中国最有力的社会思潮，其原因是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东渐的结果。以乡村为本的中国文化，遇到以都市为本的西方文化的冲击，节节败退下来。国人由羡慕而学习以应付，结果不仅没有学成新的，而且把旧的乡村破坏了。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表层意义，而其真意义则在于创造新文化。新文化不是旧的翻版，也不是纯新的东西，而是“从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第 612 页),这叫“老根发新芽”。解决乡村问题,其首要前提是奠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农民自觉性的确立、乡村组织的建立,是解决乡村问题的基本条件。否则,即使有美国、中央政府、银行界、社会团体、教育机关等的捐款、物质援助、资金借贷、人力与智力的支持，乡村也无法振作起来。

“中国无宗教而西洋有宗教”(第 635 页),西方有过团体生活的组织而中国则缺乏组织，这是中西文化的不同特点。缺乏组织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欠缺，并造成没有纪律习惯与没有组织能力的两大弊病。最近几十年来，国际竞争已经压迫到中国，缺乏组织就竞争不过别人，团体组织建立的必要性就突出起来了。现时中国特别需要的乡村组织有两个要义要注意：一是如何使乡村里的每个成员，对团体之事要积极参与，养成团体的习惯；二是如何做到使内地乡村与外面世界相交通，引进西方科学上的新的知识与方法。前者是自身组织能力的培养，后者是弥补中国文化的短缺。但乡村组织的运行,不能照搬西洋的“权利为本、法律解决”(第 654 页)的原则,而应以“中国的老道路为根本精神”。这个“精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情谊，一是改过迁善的人生向上。”(第 659 页) 同时又要吸取西方科学上的知识方法这一长处，达到中西文化的调和沟通。“我们的乡村组织，就是一个中西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这是梁漱溟在 20 年代提出“直觉为体、理智为用”的“中体西用”文化观，被具体应用于乡村建设的写照。

乡村组织不单是文化上、学术上、教育方面的，而且是合政治、经济、军事为一体的组织。其典型就是邹平的乡学村学。乡学村学以乡村的全体民众为教育对象，而以推进社会为主，但又把通常的学校教育包括在内。除了教人念书外，还讲究社会进步，如反对缠足、早婚、吸毒、赌博，改良农业种子、推行山地造林、组织合作社等。乡学村学由四方面的人员组成：学众是主力，起立法作用；教员是副力，起设计推动作用（乡学有辅导员，是县政府派下去的）；学董系本村、本乡人士中遴得相当人选后由县政府聘任，起行政作用；学长由齿德并茂者担任，起监督教训作用。这四方面的作用缺一不可，缺少一面便运行不灵了。“有学长、学董、学众、教员这四面作用，我们的村学乡学这架机器的机件，才算全备，才能运行得好。”（第 692 页）

乡学村学的管理原则，与现行地方自治组织是不同的，它不用多数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的挫伤人们情感的方法，而取尚贤尊师这一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办法，以养成合作商量与互相礼让的习惯。它不提倡自由权，因自由权与中国伦理道德不合，不符此刻中国实情。它不走法律的路而走情义的路，“是要以代表情理的学长来监督教训大众，把法律问题放在德教范围内。”（第 707 页）

乡学村学的功能有两点：一是“能使内地乡村与外面世界相交通借以引进科学技术”；二是“能使团体里面的每个分子对团体生活都为有力地参加所以养成团体组织”。（第 650 页）引进不是照搬，而是借人家的作参考，就着自己的加以改良，强调西方科学知识方法的引进要符合中国实际。第二点讲的是民主，但不是仿行现今世界上的民主，“须要在民主或民治里边开创出一个新规模新样式”。

乡学村学的目标是“大家齐心学好，向上求进步”，这是合乎宋明理学家如吕和叔、朱熹、吕坤、王阳明等人所订的乡约的精神的。乡学村学的健康发展会“成功一个真的团体，扩展为一个新的社会

制度。”(第 720 页)至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具体设想，书中并未言及。

书中反复强调“必须将学术研究与社会事实相沟通”(第 648 页)，故这部著作可以看作是梁漱溟的文化理论由历史与哲学层面，走向社会与实践层面并具体应用的初步总结。不同于其他新儒家，梁漱溟除了是哲学家外，更多地侧重于社会活动，这在新儒家代表人物中是最突出的。这部著作既是梁漱溟，也是新儒家首次把他们的济世方案付诸社会实际的实录，详细而直实地展现他们欲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同时又吸纳西方文化之长处，以解救中国问题的忧国忧民的文化心态。

《乡村建设理论》

此书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系作者于 1932—1936 年有关“中国问题之解决方法”“中国社会建设之途径”的一系列讲演的结集。1937 年 3 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出版，同年 5 月再版。1939年乡村书店迁至四川重庆后重印。 1990 年 3 月,收入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漱溟全集》第 2 卷 。

同《乡村建设大意》一样,是书也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产物,但较前书更为系统与深入。梁漱溟自称此书“是我从对中国问题的烦闷而找出来的答案”(第 146 页)。书中的观点，萌芽于 1922年,大半决定于 1926 年,而成熟于 1928 年,又经 1931—1936 年六年的乡村建设实际，故此书可说从理论到实践，完成了他的乡村建设的体系。

本书分自序、引言、甲部与乙部。甲部述乡村建设运动之缘起和对中国旧时社会结构的认识，乙部述中国问题解决之方法和途径。文化决定政治,政治根本在文化,是贯穿全书的宗旨。强调“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中国社会特殊论，认为文化失调是旧时中国社会崩溃的真实原因。重建中国并不在于暴力革命，而是要以儒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理性’为理论基础，从乡农学校入手，重振中国国有的伦理情谊和道德精神,并吸取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技术,走‘从农业引发工业’的经济发展道路，以期出现一个理想的新社会。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以重建中国的伦理本位社会，作为他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

在作了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后，梁漱溟断定，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与个人本位、阶级对立,是中国和西方社会的区别所在。“伦理关系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这种社会,可称为伦理本位的社会。”(第 168 页)伦理本位社会除体现在人际关系上的互重互爱外，表现在经济上，则形成夫妇、父子、祖孙、兄弟共财的格局。反映在政治上,因君臣、官民间存在着互重的伦理义务，而不知国家为何物。“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所以中国社会可称之为职业分立的社会。”(第 171 页)在这样社会里,只有周期性的一治一乱而无革命。除了缺乏阶级基础外，还由于无革命对象可言。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被梁漱溟排斥在革命对象之外：“现在凡是关切中国问题的人,多半痛恨两个势力:一是帝国主义,一是封建军阀。我也不能不痛恨,但大家以此为革命对象,则为错误。”(第 235 页)近代中国发生的革命运动，并非出自中国社会的内部要求，而是外力进门后自外引发的。其中留学外国的知识分子，是革命的主要动力。1911 年的辛亥革命，多数是旅日学生发动的;1927 年的大革命，则是旅俄学生发动的。从社会革命自外引发论出发，梁漱溟断定中国既不能走欧洲民主政治的路,也不能走十月革命的路。“要知道,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重大的民族自救文化改造问题。”(第 453 页) 从宣扬中国社会特殊论，到反对暴力革命,进而把政治问题归属于‘文化改造’,这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基础。

为了作进一步的理论说明，他提出了“理性”这一新的哲学范

畴。依照他的分析,在伦理本位的社会里,社会秩序是由‘理性’来维持的:‘理性’在《乡村建设大意》中提到,但只是匆匆带过,而在本书则有全面、充分的论述,用以取代 20 年代的直觉。他认为存在着两种理性主义:“一是法国理性主义,是一个冷静分析的理智;一是中国人的理性主义,是平静通晓而有情的。”(第 314 页)这两种理性主义是同宇宙间存在着两种‘理’有关:一是‘理智’,属客观事理,是知识上的‘理’,多与科学、物理、逻辑相联系;一是‘理性’,系主观情理,为道德上的‘理’,为儒家所提倡,与人的好恶、行为、情感相关。‘理性’可从两方面作界说:一是‘父慈子孝的伦理情谊’;一是‘好善改过的人生向上’(第 186 页)。前者是说‘理性’源于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情谊,后者指克己让人的道德精神。‘理性’的范围和功能极为广泛,它既包括了中国古代的礼俗与教化,又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和长处”,中国人固有精神的所在,更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缘由,且‘实在是宇宙间顶可宝贵的东西’(第 181 页)。“理性”是囊括并支配了中国人及其文化、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抽象的精神本体。既然“理性”这么美好,那末乡村建设必须从“理性”入手,从‘理性’求得一个理想的新的社会组织。

梁漱溟策划的乡村组织由四部分组成:一、乡长;二、乡农学校;三、乡公所;四、乡民会议。前二部分属文化团体系统,但要现政权承认;后二部分属现政权下之政治组织系统。核心是乡农学校。这是他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特色而为其他乡村建设派所无。另外三个部分,是从乡农学校里拓展、分化出来的。乡农学校,是集文化、学术、教育、经济、政治、军事为一体的组织,由校董会、校长、教员、乡民组成。校长由乡长兼任,校董是地方上的领袖人物,教员是外来的知识分子,乡民是学生。有替代地方自治组织特点的乡农学校,照梁漱溟看,“是中国古人所谓‘乡约’的补充改造。”(第 321 页)乡约是由宋儒吕和叔发起的,其主要纲领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乡约与中国文化的固有精神——“理性”

是相符的,它充满了‘人生向上之意’与‘伦理情谊的意味’(第 322 页)。现行的地方自治组织则违反这种精神,而以西洋政治中的‘三权分立’为原则,强调彼此牵掣防制以求均衡,讲权利本位。他希望变西方的权利观念,为‘理性’中互以对方为重的义务观念;变西方的民治、法治为中国人的人治,即以乡民积极参加为前提的贤人政治。‘补充改造’是指乡农学校适应时代的需求,注重西方科学新知识的引进,尤其是农业优良品种的引进。注重社会风气的改进,也是‘补充改造’的范围。为此,梁漱溟提出反对缠足、吸毒、赌博等主张,倡导讲究卫生、推行山地造林、组织合作社等见解。以乡农学校为中心的乡村组织的确立,就是中国固有精神和西洋文化的长处相结合的典范。这是中国理想社会的希望之光,未来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都要从乡村组织那里生长出来。乡村组织的健全发展,可以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乡村自身腐败的问题,二是匪患问题,三是共产党的问题。为了证实自己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农民运动中最好的,他攻击‘共产党杀人放火’,提出‘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的主张,认为‘我们这种运动实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轨’(第 407 页),完全可以替代共产党领导的、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农民运动。

配合他的乡村建设,梁漱溟在书中用较多篇幅来宣传其经济建设的见解。其核心是‘从农业引发工业’:所谓中国建设(或云中国经济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就是说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路。’(第 158 页)这是因为:一、发展工业易引起资本主义化,从而导致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农业不易导向资本主义,为乡村建设创造前提条件。二、农村是中国社会的根子,它不象都市那样为西洋文明所同化,传统文化与社会风俗基本未变。三、农民是中国最广大的生产者兼消费者,在中国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要使农业进步就要把握三个要点:流通金融、引入科学技术、促进合作组织。这三个方面中的每一方面,各以其他两面为条件。农业是图

翻身的凭藉，要翻到工业上。“从农业引发工业，更从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垒为推引，产业乃日进无疆。”（第 509 页）

当经济建设之路同他的反对暴力革命的政治思想，与其“文化改造”相结合一个理想的新社会就出现了，是“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第 557 页）的象征，其标志有六个：一是先农后工、农工结合为均宜的发展；二是乡村为本、都市为末，乡村与都市不相矛盾；三是以人为主体，是人支配物而非物支配人；四是落于伦理本位而不是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五是政治、经济、教化三者合一而不相离；六是社会秩序的维持，是由“理性”替代武力。近代西洋文明的社会，是与这六条标志相左的，属非正常形态。

作为全面、系统、深入地展现梁漱溟乡村建设一整套理想的这部著作，是现代新儒家中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经世致用之作。它注意到了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是 30 年代中国最为迫切的问题，敏锐地观察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是在农村，这在现代新儒家中是少有的，也是有其合理因素的。梁漱溟规划了中国未来社会的蓝图，并且冠以社会主义的美称，但却找不到这一目标实现的可靠途径。这里既有错误地分析中国国情之处，又有幻想依靠旧政权的支持，以和平、改良的方式来长入理想社会的不切实之处。至于激烈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既反映了现代新儒家在中国革命发展中所起的阻碍作用，也是现代新儒家文化保守主义在政治上的集中反映。

《中国文化要义》

这部著作的写作过程颇长，先后历时九年始于 1942 年春，终于 1949 年 6 月。1949 年 11 月，由成都路明书店初版。1987 年 6 月，上海学林出版社重印时，作者曾作校勘订正。1990 年 5 月，收入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漱溟全集》第 3 卷。编者据前两个本

子，在文字与编排上又重新作了订正。又此书的第一、二章于 1947 年在《观察》杂志上连载过。

写写停停、酝酿多年，是由于作者因战争与国事时时辍笔之故。1946 年 5 月，梁漱溟以民盟秘书长的身份，代表当时的第三方面势力，参加了国共和谈。由于他坚决反对以武力解决中国国内问题，强调折衷调和，提出了国民党政治上让步实行宪政、共产党军事上让步交出军队的方案。这一代表他个人，也代表第三方面的政治设想未被国共双方接受。1946 年底国共和谈破裂，对政治感到绝望的梁漱溟，辞去民盟秘书长，专心于办学与著述。他感到有必要从文化层次对中国的过去与未来作一番理论上的清理，遂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作为研究课题，再次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去寻找答案，以便为中国今后政治找到一理想的出路，便是本书写作缘起的社会背景。

以宗教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因理性早启而形成中国文化的早熟，是本书的两个理论支撑点。中国文化的诸多特征，中国社会的特殊形态，都是由此而来的。

坚持文化不同路向说的梁漱溟，指责文化的“独系演进论”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这种观点视人类的不同文化是循着一条路线前进的,其表现之不同如‘大同小异’‘循序渐进’,‘便是代表此一条路线的各阶段”(第 43 页)。这种文化演进‘阶梯观”,是与进化论相违反的。正确的见解是文化演进的‘流派观”,似树上枝干分出横生而非一条线上的各阶段：“纵观世界人类各族，此一文化，彼一文化,于形形色色不同之中,又深浅高下不等,正亦犹是。不可误以流派为阶梯。’(第 47 页)在作了这样铺垫后,梁漱溟断言‘:西方之路，基督教实开之，中国之路则打从周孔教化来的，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第 97 页）中国古代社会与古希腊、罗马社会，原本是相去不远的。到了罗马帝国后期衰落之际，东方的基督教传入，使西洋古代文明得以续命，并且孕育出近代文明的特质

——团体生活,即西方的民主制度“:德谟克拉西风气,实为人类社会生活一大进步之见证。所谓民主制度,正不外一种进步的团体生活。”(第 50 页)由此,西方文化重视的是“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制精神。这些‘公德’在缺乏集团生活的中国人那里是不存在的。“周孔教化便为中国人打开了家族生活之路”(第 77 页),“西方人集团生活偏胜,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正是分向两方走去,由此开出两种相反的文化。”(第 76 页)由‘周孔教化’之故,中国文化没有强烈的宗教气息,“他的礼乐有宗教之用,而无宗教之弊。”(第 114--115 页)以道德代宗教遂成中国文化一大异彩。“举周公来代表他以前那些人物,举孔子来代表他以后那些人物”(第 103—104 页)“;周孔教化’作为一个众多人物的集合名词,其实是指以周公、孔子为核心的儒家及其学说。

就宗教和文化的关系言,宗教对文化有决定和主宰的作用:“人类文化都是以宗教开端,且每依宗教为中心。”(第 97 页)宗教是以超绝于人类知识为根据,以情感之安慰与意志之依赖为支柱的。尤其是人类文化之初期,情志的不安出于人对自然环境之不了解,是有它的必然性,因而人都有倾向于出世的要求,宗教之根本即源于此。文化以宗教为开端,中国亦无例外,故图腾崇拜、庶物崇拜、群神崇拜、祭天祀祖等等原始宗教也是存在的。待“周孔教化”兴起之后,中国文化中心便移到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上了。就历史影响而言,孔子大过周公。宗教必备的要素,在孔子身上不存在,“在孔子有他一套精神,又为宗教所不能有,这就是他相信人都有理性。”(第 105 页)孔子专从启发‘理性’上下功夫,理性早启的结果,是造成中国文化的早熟。

“理性’是梁漱溟用得最多的一个范畴“;它将是本书一最重要之观念。”(第 48 页)本义为道德的‘理性”,内涵却相当宽泛:一、它是人类的特征所在;二、它是中国文化特征之所寄;三、它是社会的骨干,旧秩序的维持者,新社会的粘合剂;四“;理性’为心,即人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